

# 八十年代马来西亚青年组织的发展与影响：以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为例

张运华、陈亿文、吴明珠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敦陈祯禄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

[changyf@utar.edu.my](mailto:changyf@utar.edu.my), [chinym@utar.edu.my](mailto:chinym@utar.edu.my), [wumc@utar.edu.my](mailto:wumc@utar.edu.my)

## 论文提要

在众多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把华团划分为地缘性、血缘性、业缘性、文化、宗教、政治和秘密会社七大类。相对而言，关于华裔青年组织的论述却往往被粗略地归纳在以上社团的附属团体或学生运动的框架下进行。目前，马来西亚有七个主要的全国性华裔青年组织。这些华青组织除了拥有完整和独立自主的组织架构外，在全国各个地区亦设有分会或支会，形成本身的一个基层组织网络。当中，以创立于 1975 年的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简称“青团运”）最具规模和影响力。青团运的草创初期正是马来西亚左翼思潮和学生运动式微之时。在创会总会长郑安泉的经营下，青团运以十年的时间从青年组织扩展到拥有五千万美元资产的合作社并拥有二十万名会员。郑安泉甚至在 1986 年加盟并接管人民进步党出任党魁一职。本文从青团运创立前的时代背景切入，剖析青团运与学生运动、执政联盟成员马华公会的微妙关系，以及探讨青团运如何在短短十年间发展成为足以影响华人社会、政治及经济的青年组织。

## 1. 前言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是当地华人社会发展、乃至整个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不但是因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积极参与本国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教育及文化活动，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华人社团积极维护与传承民族文化，让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和台湾以外保存华族文化和华文教育最完善的地方。

根据官方的数据，马来西亚的注册华人社团超过一万个；主要分为地缘性、血缘性、业缘性、文化与宗教、政治和联谊性等社团类型<sup>1</sup>。在众多的华人社团当中，有些社团除了母会之外亦设立了青年团及妇女组两个臂膀，分别提供适当的平台给年轻会员和女性会员发挥所长，同时为组织培养接班人。以青年团为例，这些青年团包括会馆青年团、政党青年团、宗教团体青年团等。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然而，这些著作主要针对组织母会进行研究和论述，鲜少触及附属青年团或妇女组的发展历史。另外，国内外学者在讨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时往往忽略了非附属性的全国性华裔青年组织，如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简称青团运）、马来西亚青年运动（简称青运）、马来西亚大专青年协会（简称大专青）等。

另一方面，华裔青年组织也是马来西亚青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来西亚独立前的反殖民运动到独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再到目前的民主运动浪潮，华裔青年一直都积极参与我国的青年/学生运动。即使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所谓的马来西亚学生运动低潮期，华裔青年继续通过个别的组织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的行列。可惜的是，我国学术界对华裔青年组织的研究著作极为鲜见。

本文从青团运创立前的 1970 年代背景切入，剖析青团运与学生运动和马华公会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探讨青团运如何在短短十年间发展成为足以影响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政

---

<sup>1</sup> 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研究可以参考石焜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治及经济的青年组织。本文所采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青团运的会议记录和出版刊物。由于青团运总部经历多次的搬迁和领导层对史料保存缺乏认识，许多重要的资料已经遗失。因此，我们也透过报章资料和前领导人的访谈进行补充及理清许多矛盾之处。

## 2. 青团运的发展与组织结构

青团运创会总会长郑安泉于 1974 年 12 月 1 日在马六甲一个小村庄“地和”注册成立地和青年会<sup>2</sup>。过后，郑安泉积极在州内推动成立青年组织，从 1974 年 12 月至 1975 年 3 月之间在马六甲州内整顿和重新活跃了 18 个冬眠的青年会。由于这些青年会拥有本身的独立注册，各自为政而使组织松散，难有作为。因此郑安泉决定把这些青年会的组织统一起来成为一个“青年团结运动”，并于 1975 年 2 月 8 日于马六甲 Trangquerah 路 347 号建筑物内召开成立马六甲州青年团结运动第一次筹备会议<sup>3</sup>。同年 4 月 11 日马六甲青团运正式成立。各支会拥有青团运统一的组织章程和结构。马六甲青团运的标志由两只灵鹿，星星和月亮组成<sup>4</sup>。到了 1975 年 8 月 5 日，成功注册的青团运支会增加至 27 个，会员人数达 1501 人。



图一：马六甲青年团结运动标志（左）及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标志（右）。

1975 年 8 月 11 日，郑安泉获得理事会支持修改章程和标志，把青团运扩展成为全国性的青年组织并于 10 月 26 日在吉隆坡班登村青年礼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自马六甲、柔佛、森美兰、雪兰莪和霹雳等州的 92 位代表，遴选了第一届青团运中央委员会成员，由郑安泉担任总会长，总秘书为李荣双。青团运总会于 1976 年 4 月 21 日正式获得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批准注册。当时青团运在全国已经拥有超过 200 个支会，会员人数超过 2 万人，并把组织扩展至其它州属。青团运在全国各地的发展非常迅速，许多地方的青年领袖纷纷要求成立青团运支会。到了 1978 年，青团运支会已达 500 个，会员人数 6 万人<sup>5</sup>。到了 1983 年，青团运已经发展成拥有 900 个支会，会员达 20 万之众<sup>6</sup>（见表一），成为马来西亚规模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华裔青年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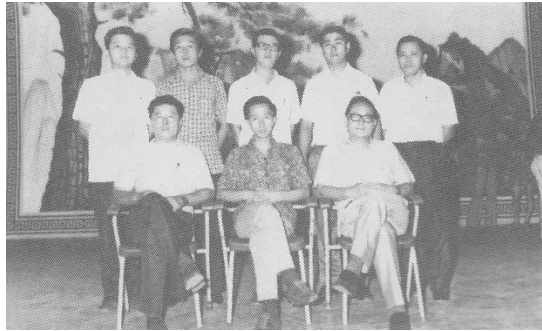
<sup>2</sup> Gerakan Belia Bersatu Malaysia (Mei 1984), Gerakan Belia di Malaysia, Kuala Lumpur: GBBM, pp. 32.

<sup>3</sup> 马六甲州青团运第一次会员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75 年 2 月 8 日。

<sup>4</sup> 马六甲州理事会会议通知信函，1975 年 11 月 3 日。

<sup>5</sup> 青团运，《青年论坛 1》，吉隆坡：青团运总部出版，1978 年 5 月，第 7 页。

<sup>6</sup> Gerakan Belia Bersatu Malaysia (Mei 1984), Gerakan Belia di Malaysia, Kuala Lumpur: GBBM, pp. 36.



图二：1975年青团运全国筹委会。当中有总会长郑安泉（前中）、副总会长何柑柚（前右）及总秘书李荣双（前左）

表一：青团运支会数量与会员人数

年份	支会数量	会员人数
1975年8月	27	1,501
1976年4月	200	20,000
1978年	500	60,000
1982年10月	615	98,843
1983年	900	200,000
1985年	1188	≥200,000

青团运是马来西亚第一个以青年活动性质的注册全国性华裔青年组织，只开放给年龄介于 15 岁至 35 岁之间的马来西亚青年<sup>7</sup>参与。其主要宗旨是结合青年的力量进行各种社会工作和福利计划，培训年轻领袖推动国家发展及灌输效忠国家的精神。其章程也清楚列明青团运不附属任何政党或与政党有关系的团体<sup>8</sup>。



图三：青团运新旧注册证。（左）1976年在社团法令注册的注册证，（右）2008年在青年团体法令重新注册的注册证。

<sup>7</sup> 总会长可以批准超龄者继续竞选和担任职位至 40 岁。会员年龄于 1978 年改为 15 至 40 岁之间。

<sup>8</sup> 青团运章程，1975 年，1976 年，1978 年，1985 年。

青团运的组织结构分为四个阶层，即支会、县会、州分会和中央委员会。每一个支会由当地的至少 30 名合法会员所组成，并由会员遴选出支会理事会。接着，在同一个县区里至少要 5 个支会才能成立该县会理事会。特别的是，州分会并非由县会组成，而是由支会所组成。当支会数目达到 10 个后，有关州属便可以成立州分会，即便该州属没有任何县会。青团运最高的组织单位为中央常年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成员、各州分会和县会合法理事代表所组成。由中央常年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则是青团运的最高行政单位，负责管理和执行关于青团运的一切事务，包括支会、县会和州分会的行政。

早期的青团运奉行中央集权制，总会长通过中央委员会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为了确保总会长在中委会拥有多数的支持，总会长可以在票选中委以外委任 2 至 5 名非票选中委。青团运对各属会的管制也是相当的严密。支会、县会及州分会的一切对内书信，包括会议通知和会议记录都要呈上副本予总部备案，而对外的书信则必须由总部发出。所有支会的常年会员大会日期必须由总会长决定。而县会和州分会的常年代表大会需有中央委派 2 至 5 位的观察员出席。另外，任何人欲成为青团运会员必须获得各一名普通会员的提议和附议，然后由中委会批准。而且，各属会在委任顾问及邀请外宾出席活动前都必须获得总部的书面批准<sup>9</sup>。这些措施旨在提防任何有能力威胁总会长权力或危害组织的个人渗透到青团运的组织内部。任何损害青团运名誉，包括批评青团运领袖的会员将被开除，而中委会拥有绝对的权力接管或解散相关属会。

### 3. 青团运的扩展和影响力

当青团运的组织运作上了轨道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寻求经济自主和扩大影响力。在 1970 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华社为突破新经济政策的困境而吹起了凝聚华商朝向大企业进军的号角。郑安泉曾对心腹说：“现在我们也应该去搞像马化合作社这样的组织了，赠送小鸡并不能改变会员的经济地位，唯有搞大企业才是办法”<sup>10</sup>。于是，青团运在郑安泉的领导下于 1977 年 1 月 17 日创立了青团运合作社，发售股为每股马币一百元。青团运合作社的业务迅速发展，到了 1983 年已经挤入全国合作社最多社员的第 20 强，及资产最多的第 8 名，分别达到 11,805 人和 51,546,589 美元。青团运合作社的业务涵盖油棕园、可可园、金融部、屋业发展、报社与印刷业、快餐业、烟酒和电池贸易、幼儿园等<sup>11</sup>。根据曾经担任金融分行经理的青团运第五任总会长陈德贤的回忆，在青团运合作社最风光之时，许多县会或支会主席同时也担任青团运合作社的金融分行经理一职。

青团运合作社的成功，给了很大的鼓舞；青团运乃于 1984 年成立“青团运基金”的第二项经济计划。青团运基金通过发售一百万张彩票<sup>12</sup>的方式筹募资金进行社会福利、教育培训、经济活动和大学奖贷学金等计划。接着于 1985 年 2 月份举行的第九届常年代表大会决议创立团运控股公司，集合资金向大企业进军<sup>13</sup>。团运控股公司计划筹资一千万元来进行几项经济计划，包括在马六甲兴建一座十六层楼大厦<sup>14</sup>。

---

<sup>9</sup> 青团运，《青团运活动指南》，1983 年 4 月。

<sup>10</sup> 新生活报，1994 年 3 月 9 日。

<sup>11</sup> 青团运合作社，“GBBM KOSATU 简介”，青团运合作社及青团运总会出版，1985 年。

<sup>12</sup> 建国日报，1982 年 12 月 6 日，1984 年 10 月 20 日及 1985 年 5 月 28 日。星洲日报，1985 年 1 月 28 日。星报，1985 年 5 月 20 日。

<sup>13</sup> 青团运合作社，“GBBM KOSATU 简介”，青团运合作社及青团运总会出版，1985 年，页 22。

<sup>14</sup> 建国日报，1985 年 5 月 28 日。



图四：青团运合作社标志（左），团运控股公司标志（中），青团运基金标志（右）



图五：青团运合作社、控股和基金会的一部分业务。美达花园金融分行（上左），青团运基金彩票（上中），彭亨直凉的油棕园（上右），青团运合作社用作屋业发展的土地（中左），建国日报位于八打灵再也 13 区的总社（中），温比快餐店（中右），代理的各种电池（下左），忠诚印务有限公司（下中），代理的酒类（下右）

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郑安泉开始把青团运的影响力渗透至其它青年团体、华团和政党以实现领导华人大团结的远景。郑安泉在 1982 年 10 月制定了青团运五大目标团结华裔青年后，于 1983 年 2 月 5 日又推动年青人的精神革命运动和青团运先锋队，目标是以 17 年的社会工程来改善华人社会的劣根性及改革青年的思想，在 2000 年实现华社大一统

的新面貌<sup>15</sup>。接着，郑安泉于1983年开始策划成立一个由青团运主导的华裔青年咨询理事会<sup>16</sup>，汇集马来西亚二十个华裔青年团体的力量，更有效地表达、反映和讨论各项课题。该华青咨询理事会将包含八个以华裔青年为主的注册团体，九个全国性乡团的青年团和一些文化宗教团体。

除了青年组织，郑安泉也将青团运的影响力渗透至乡团组织和政党。他要求青团运的领袖进入各类华团的领导层<sup>17</sup>：

*“因此，团运要栽培一群新的领袖，能在社会举足轻重而深入各乡团把华族团结起来”*

*“我们要训练好我们的领袖，而深入华团，乡团及政党，以达至全民团结的目标”*

1983年6月19日，郑安泉在青团运芙蓉县会的华裔青年精神革命推动礼时上再次强调必须整合华团的重要性<sup>18</sup>：

*“在这不安定和彷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分析整体政治制度，深入分析华人和马来人政治体系，可以发现是我们的政治思想落后，要是不加以改革，而照旧过去的做法，我们就不能建立一个共同的思想，我们的弱点一是没有目标宗旨，二是华人间不能合作。目前我国共有零零散散四千到五千华人乡团机构，就是这种情势分散彼此的联系，要是不能联合所有华社乡团，整体力量就不能集中。目前我们先要做的就是先把华社乡团搞好，由小组织搞成大组织，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华团总会，联合所有华社乡团，以一至的意见，向政府提出总结意见的要求。青年组织也应团结在一起，因此我们已经成功成立了华裔青年咨询理事会。我国华人各宗教团体也应该组织一个宗教总会”*

当时担任全国总秘书的青团运第四任总会长李绰钧透露，郑安泉的策略几乎成功，在各个青年组织和政党都有来自青团运的领袖或支持者，并直接或间接地听命于郑安泉。在地方上，时任马华公会署理总会长兼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拿督梁维洋亦答应安插二或三名以上的青团运代表进入全国各地的新村发展委员会<sup>19</sup>。根据李绰钧和陈德贤透露，虽然郑安泉在马华公会受到压制及在两次党争中失利，但许多政治人物为了获得青团运雄厚的财力和人力支持而纷纷等待预约会见郑安泉。

1986年，当马华公会的梁陈党争结束后，郑安泉随着梁维洋淡出政坛。可是，时任马华公会副财政部长拿督陈忠鸿却邀请他重返政坛，接任人民进步党的党主席职位<sup>20</sup>。同年

---

<sup>15</sup> 关于华裔青年精神革命运动的系列讲词可参阅青团运出版《郑安泉言论集一：1982年至1983年》，吉隆坡，1984年，页14-23。

<sup>16</sup> 通报，1983年3月19日。

<sup>17</sup> 青团运，《郑安泉言论集一：1982年至1983年》，吉隆坡，1984年，页16，23。

<sup>18</sup> 青团运，《郑安泉言论集一：1982年至1983年》，吉隆坡，1984年，页20。

<sup>19</sup> 通报，1983年3月19日。

<sup>20</sup> 新生活报，1994年3月5日。

3月郑安泉正式加盟人民进步党并出任党魁一职后所采取的第一步骤就是在全国积极开展广招党员运动，其首个目标便是向青团运会员招兵买马，以加强本身在党内的基层组织力量<sup>21</sup>。根据李绰钧回忆，郑安泉在霹雳州召集了青团运全国各阶层领袖，并出其不意的要大家填写入党表格<sup>22</sup>。郑安泉也寄发人民进步党入党申请表格给青团运合作社的金融部，协助招收党员<sup>23</sup>。许多身为马华公会党员的青团运会员也追随郑安泉加盟人民进步党。例如人民进步党槟城州联委会于1986年3月9日成立时，超过半数的领导人是来自青团运槟城州分会的理事、青团运中央联络员或青团运合作社金融部主任，当中有青团运槟城州秘书陈良成（进步党州秘书）、署理主席陈玉钟（进步党州青年团团团长）、县会秘书黄金凤（进步党妇女组主席）、王荣裕、陈德清、甄福元及许春铭等人。

#### 4. 青团运与学生运动和马华的关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一个风云剧变的时代，意识形态的博弈，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影响了世界历史的面貌。首先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民主国家与共产国家两个意识形态的政体；再来是民族主义的兴起造就了新兴国家的成立与殖民主义的溃败<sup>24</sup>；最后是公民社会的锥形争取公民自由权利而对威权政权的挑战<sup>25</sup>。同样的，马来西亚在1969年至1974年之间也受各种思潮的影响而使当地的社会面对着种种矛盾和挑战。当中，有几项事件对青团运的成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在客观条件。

##### 4.1) 人民抗争与学生运动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许多华裔学生与知识青年因为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而纷纷投入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在新马两地先后成立了数十个地下组织。当中的佼佼者有活跃于南马的“马来亚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新青盟），顶峰期人数达800多人<sup>26</sup>。因此，华人往往被渲染成等同于共产党以取得马来人的团结<sup>27</sup>。与此同时，更多的各族知识青年投入了学生运动行列，积极参与人民的抗争。1969年后，政府设立了四所新的大学，即国民大学、理科大学、工艺大学和农业大学，促使大学生人数激增。这个发展协助学生运动扩大影响力，甚至形成一股足以威胁执政集团的力量。另一方面，新大学让更多来自农村和贫穷家庭的各族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就读，改变了学生运动只关注校园事物的性质。大学生对农民和贫穷问题更能感同身受，开始更贴近公共议题和积极参与人民抗争的行列。

---

<sup>21</sup> 星洲日报，1986年3月4日。

<sup>22</sup> 另有消息透露，郑安泉以青团运会员名册一口气为人民进步党注册了整千个党支部。

<sup>23</sup> 星洲日报，1986年3月13日。

<sup>24</sup> 陈剑，〈意识形态与新马四十年社会变迁〉；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2005》，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6年，251-278页。

<sup>25</sup> 潘永强，〈远离治理：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当前处境〉；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2005》，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6年，279-304页。

<sup>26</sup> 铁疆，〈风雨征程：地下组织新盟简史〉；陈剑，《风云书丛第四辑》，八打灵：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3年。

<sup>27</sup> 魏月萍，〈马来马共的历史论述与制约〉；詹缘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第十四期，2011年，页1-24。

以 1969 年的直落昂(Telok Gong)农耕地事件为例,当时的农民面对贫困及农耕地不足的问题,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即刻走出校园,声援当地农民要求政府解决问题<sup>28</sup>。根据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1)的整理,学生组织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参与了三个的大型人民抗争运动<sup>29</sup>:

- (i) 1973 年的“扣留营大罢食”事件:甘文丁扣留营里的政治扣留者黄民侨因受不了虐待和病痛而于 1973 年 12 月 29 日自杀身亡。这起事件引起了华都牙也政治扣留者的不满而要求了解真相和营方改善医药福利。然而,营方却出动了警察和镇暴队暴力镇压。华都牙也政治扣留者决定在同年 12 月 29 日展开 47 天的大罢食运动,1974 年 1 月 13 日扩散至甘文丁扣留营。同时,扣留者的亲友极为担心他们的健康而决定站出来捍卫扣留者。政治扣留者的抗争获得学生组织的同情并向政府施加压力,最终引起联合国秘书长的关注。营方最后被逼让步答应改善扣留营内的环境。
- (ii) 1974 年打昔乌达拉事件:1970 年代,因国家经济不景气导致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没有办法之下,几户穷苦人家在柔佛州打昔乌达拉一块空置的土地上建立了他们的家园。消息传开后,更多穷人都搬到这里居住,包括工厂工人、政府部门员工、小贩、司机等。在大选期间,执政党领袖在拉票时亦承认他们的地位,土地局甚至还发出了地段号码给村民,此村则被命名为国阵村或甘榜拿督胡先翁。但在大选后不久,村民竟接获土地局通知要求搬迁。在求助无门之下,村民转向大专生求助并很快得到了马大学生会、马大社会主义学生会及马大华文学会等学生团体的回应支持。同年 9 月 15 日,镇暴队包围了打昔乌达拉的进口强行拆屋,学生领袖如希山慕丁拉益士等亦被扣留。此事件激怒了大专生。约 2500 名大专生于 9 月 20 日聚集在首相署和平示威却遭受镇暴队阻止。9 月 21 日,马大学生会及宿舍委员会共同成立了临时最高委员会和平接管了马大校园的行政权。同一天晚上,由马大马来文学会会长阿兹山苏丁带领的亲政府的爱国者最高委员会武力突袭最高委员会办事处和接管了校园的行政。几天后,政府终于宣布吊销学生会和马大社会主义学会的注册。马大生开始进行罢课抗议并获得各大专生团体的支持。
- (iii) 1974 年华玲事件:由于树胶的价格剧跌和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暴涨而导致断粮的孩童丧命,大约一千名农民于 1974 年 11 月 19 日在吉打华玲游行示威,到了 21 日人数已达到 13,000 人。同年 12 月 1 日,大约 3 万人出席了一场群众大会要求政府采取适当行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华玲农民的斗争也得到了全国大专生的支持。1974 年 12 月 3 日,大约 5000 名来自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聚集在吉隆坡的雪兰莪会馆大草场举行集会,捍卫受压迫的农民。然而,政府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手段进行大逮捕,大批警察进入马大校园搜查和动用内安法令逮捕了多位讲师和学生领袖,包括当时的大马回教青年组织主席安华依不拉欣。同年 12 月 11 日,超过 2000 名马大生举行示威抗议政府扣留学生领袖。

面对日益高涨的学潮,执政的国民阵线(国阵)政府已经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为了避免学生运动与人民抗争进一步结合,威胁国阵政权,政府被迫强力镇压学生运动及离间学生之间的团结并诉诸制定严苛的法令来管制学生运动,让学生的斗争力量越来越疲弱。

<sup>28</sup> 林彦安,《隆雪华青与废除大专法令运动》,八打灵:拉曼大学毕业论文,2012。

<sup>29</sup>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资料组,《人民力量:一个不间断的传统》,八打灵: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1年。



政府在 1975 年提呈《大专法令修改条文》，解散所有学生会，全面限制大学生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禁止大学生参与社会团体的活动。紧接着，政府动用内安法令逮捕参与学生运动学生领袖，学生在没有审讯之下被长期扣留，导致马来西亚学生运动从 1975 年至 1998 年销声匿迹。

另一方面，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也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通过文艺舞台表演的形式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他们的舞台表演属于“民族的形式，阶级的内容”，歌颂劳动、反对剥削与压迫，社会批评意识极强<sup>30</sup>。马大华文学会于 1972 年至 1974 年间联合校外团体在南北马巡回演出《春自人间来》和《春雷》大汇演。可是《春雷》在 1974 年演出前即被政府禁止，8 名筹委会成员被政府以内安法令扣留。在这之前，马来亚大学学生会定于 1973 年 8 月 4 日及 5 日举办「1973 年校园文化研讨会」，目的是要在马大校园落实有强烈同化倾向的「国家文化政策」，成为马大校园内一切文化活动的指导原则与政策的基础。为了反对校园文化霸权及维护学生自主，马大华文学会联合马大淡米尔文学会采取多项措施，包括致函学生会主席阐述文化研讨会的影响，发表文告正式宣布杯葛文化研讨会及召集六七百名学生在同年 8 月 4 日进行游行抗议，成功迫使研讨会暂时取消。此次的抗议活动获得校内非宿舍生组织，工程学会等组织的积极响应<sup>31</sup>。然而，政府在 1974 年 12 月 19 日发表国会白皮书，指马大华文学会涉及共产党之颠覆活动而关闭华文学会长达 12 年之久。

#### 4.2) 青团运为政府收编左翼学生运动的外围组织

青团运创立之时正值马来西亚左翼思潮和学生运动骤然从高峰期进入了寒冬期。为了阻止学生与青年继续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政府一方面采取强硬打压行动，包括祭出 1974 年国会白皮书查封马大华文学会，内安法令逮捕学运领袖和 1975 年《大专法令修正条文》禁止学生参与社团。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亲政府组织对青年和学生进行有计划性的收编，通过有组织性地把青年的精力转投在体育和文娱活动上。在 1975 年之前，马来西亚只有区区的九个全国性青年组织。这些组织包括以马来青年为主的半岛马来学生联盟（Peninsula Malay Student Union, 1948 年成立），4B 青年运动（Malaysia 4B Youth Movement, 1965 年成立）和回教青年运动（Malaysian Islamic Youth Movement, 1970 年成立）；以印裔青年为主的兴都教青年组织（Hindu Youth Organisation, 1951 年成立）；以华裔青年为主的马来西亚基督教青年全国理事会（基督青，1950 年成立），马来西亚佛教青年学会（马佛青，1970 年成立）和马来西亚青年运动（青运，1972 年成立）；及跨族群的马来西亚童军联合会（1910 年成立）和马来西亚女童军（Girl Guides Malaysia, 1916 年成立）。因此，除了有宗教背景的马佛青和基督青，可以让华裔青年参与的组织只有青运。然而，青运的前身是 1960 成立的马来亚青年职工运动，属于职工会的性质，专注在青年就业、职工福利与培训方面的问题。它的发展较为缓慢，会员人数不多。其它的地方性青年会则大多数受左翼进步青年所控制。在这种机缘下，郑安泉要成立一个亲政府的华裔青年组织自然水到渠成，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祝福。虽然青团运成立的目的和宗旨和其它文娱性的组织无异，但是以下的一段记录清楚说明成立青团运的真正原因：

<sup>30</sup> 李亚遨，《1970-80 年代华社维权运动与春雷》，林连玉基金网页，2010 年 12 月 21 日。

<http://llgcultural.com/1970-80> 年代华社维权运动与春雷/

<sup>31</sup> 李亚遨，《淹没的激情—当年马大一场反对「国家文化政策」的斗争》，东方日报，2007

“成立的原因是当时的国家安全受到破坏分子和共产党人士的威胁。这包括了 (i) 霹雳州总警长被刺杀, (ii) 多个州属的特别行动分部官员遭到杀害, (iii) 国家英雄墓碑遭到炸弹袭击, (iv) 破坏分子对警察训练营和其它方面所采取的残忍行为。这些破坏分子都是来自同一个族群的青年。”<sup>32</sup>

这里所指的同一个族群的青年很明显地是指华裔青年。另外,郑安泉在成立青团运时和时任马来西亚文艺青年部部长达成 5 项基本共识<sup>33</sup>:

- 1) 吸引华裔青年参与青团运。
- 2) 加强华裔青年和文青部的关系。
- 3) 加强华裔青年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关系,让他们了解政府部门也提供和制造机会给华裔青年。
- 4) 促使华裔青年远离共产主义的影响。
- 5) 加强华裔青年和巫裔及印裔青年的关系,让彼此没有隔膜。

很明显地,第一、第二和第四共识表达了政府欲通过青团运来吸引华裔青年并远离左翼思潮的影响。青团运的宗旨并没有纳入这三项共识,而是以较为中性和温和的方式出现在章程里,为的是避免引起青年的戒心而抗拒青团运。当郑安泉到马六甲各地跑动及解说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注册青年组织时,他以“有青团运就有权利向政府开口争取青年组织的拨款及各种利益“为号召力吸引青年男女加入<sup>34</sup>。郑安泉本身欲通过成立一个青年组织团结华青力量,瓦解左翼残留分子,以另一种和平协商的方式展开斗争是有迹可循的,且从来都没有改变:

- (i) 在 1970 年代初学生运动高峰期,郑安泉就在学生运动最为活跃的马来亚大学求学,并且于 1971 年至 1974 年期间三度出任马来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研究学会主席。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资料显示郑安泉在马来亚大学期间曾经参与任何支持或反对政府的学生运动。但是从郑安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即执政联盟成员马华公会青年团(马青)马六甲州分团团团长一职可以论断郑安泉不可能参与反对政府的活动。
- (ii) 从青团运第一个马六甲地和支会于 1974 年 12 月 1 日成立到 1975 年 2 月 2 日短短两个月内发展为 19 个支会的过程和速度来看,青团运早期的支会主要是以接收和改编当时的青年会为主。例如马六甲亚逸莫鲍(Air Merbau)支会<sup>35</sup>的成立日期为 1974 年 8 月 6 日,比地和支会还要早 4 个月。唯一的可能性是亚逸莫鲍支会是当时的一个已注册的青年会,在郑安泉成立地和青年会后重组并加入组成青团运。接下来分别于 1974 年 12 月 11 日在 Simpang Bekok, Parit keliling, Pondok Batang、12 月 17 日在 Ayeh

<sup>32</sup> Gerakan Belia Bersatu Malaysia (Mei 1984), “Gerakan Belia di Malaysia”, KL: GBBM, pp. 32.

<sup>33</sup> Gerakan Belia Bersatu Malaysia (Mei 1984), “Gerakan Belia di Malaysia”, KL: GBBM, pp. 32.

<sup>34</sup> 新生活报, 1994 年 3 月 5 日。

<sup>35</sup> 新生活报, 1994 年 3 月 5 日。

Keroh<sup>36</sup>、12月18日在Lendu<sup>37</sup>、12月19日在On Lok, Masjid Tanah、12月20日在Umbai、12月23日在Kemendore<sup>38</sup>、Merlimau、12月25日在Machap Umboo、12月28日在Machap Baru<sup>39</sup>、1974年12月30日在Gadek、1974年12月31日在Taboh Nanning、1975年1月1日在Bukit Rambai、1月9日在Simpang Gading<sup>40</sup>、2月2日在Bemban成立青团运支会。另一个例子是李焯钧在加入青团运之前就已经领导雪州的一个青年会。

- (iii) 1983年7月1日，青团运提呈了一份备忘录给时任教育部部长苏莱曼反对教育部批准马大华文学会重新获得注册。青团运支持政府关闭马大华文学会并认为改学会的部分理事受到不良分子的误导而进行非法活动<sup>41</sup>。

#### 4.3) 马华是成立青团运的推手

发生于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事件”不但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也对我国的族群关系造成极大的破坏。种族冲突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包括<sup>42</sup> (i) 族群关系恶化：巫统领导人利用这次事件极力煽动马来人对非马来人的恐惧感，建立完全由马来人/巫统执掌政权的政治体制，实现其政治霸权的目的；(ii) 催生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虽以逐渐减少并最终消除族群之间的经济差异来实现国民团结为目标。但实质上，新经济政策社会重建的核心内容在于建立马来人特权，以压缩其它族群的发展空间来实现未来二十年内马来人在工商各领域占有30%以上股份。

马华公会作为代表马来西亚华人在执政联盟的代表，在1969年的全国大选中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败。在参选的33个国会议席中只赢取13席的差强人意表现。1971年马华公会总会长陈修信积极修补和华团合作的关系并倡议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sup>43</sup>。然而，社团领袖却否决了此建议而另组织了一个被称为马来西亚华人促进团结委员会以统领华人大团结运动并表明将申请注册为一个政党。后来在巫统领导人的干预下，华人大团结运动终被瓦解和被马华公会接办了<sup>44</sup>。

早在1971年当郑安泉还在马来亚大学念大一的时候已认识在马大当教授的梁维洋，但尚属泛泛之交。可是有一天，马华总会长陈修信却委派其政治秘书吕鸿元到马大校园约见郑安泉。初次见面，陈修信即邀请郑安泉加入马华公会。陈修信还吩咐马华八打灵区会主席黄奕岁为郑安泉安排免费住宿、水电费和活动场所，地点在黄奕岁的办公

<sup>36</sup> 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记录为1974年12月26日。

<sup>37</sup> 总部的资料有提及 *Persatuan Belia Bemban*，但没有任何记录可查。

<sup>38</sup> 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记录为1975年1月2日。

<sup>39</sup> 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记录为1975年1月7日。

<sup>40</sup> 根据青团运总部配合25周年庆出版的特刊的资料出现数量矛盾，故未加入数量。即在页18的“青团运的成立”说成立了34个青年会，但在页69的“马六甲州分会简介”里却是37个。再者，“简介”中提及在1974年12月至1975年1月成立的名单又与数量不符。故以名单为准。

<sup>41</sup> 青团运出版《郑安泉言论集一：1982年至1983年》，吉隆坡，页49。

<sup>42</sup> 林勇，《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1957-2005）》，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92页。

<sup>43</sup> 郑文泉、傅向红，《粘合与张力：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内关系》，加影：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2009年。

<sup>44</sup> 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页266。

室三楼，拥有两间房间和如店面般大的大厅<sup>45</sup>。到了1974年，当时已经担任副文青部长的梁维泮便鼓励郑安泉搞青年组织，并承诺扶持他成为国内最强的华裔青年组织<sup>46</sup>。

1974年11月5日，当时还是马来亚大学在籍学生的郑安泉参加了团结部为新村青年主办的三天集训<sup>47</sup>。主办当局邀请了文青部官员讲解有关青年会的各种活动与好处，并引起了郑安泉的注意和兴趣。集训过后，郑安泉拜访了马六甲州文青部总监佳哈里反映成立注册华裔青年组织的意愿。这项献议首先受到巫青团的反对，他们认为华裔青年不应该另起炉灶，而是应该参加当时已存在的4B青年组织。当时郑安泉不顾反对，亲自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结果注册官不敢批准他的申请<sup>48</sup>。

郑安泉转向文青部部长阿里阿末求助，洽谈成立一个以华裔为主的青年组织。郑安泉的这项计划正好符合了政府有意填补学生运动被打压后所留下的青年活动空间。在文青部部长征得当时的首相敦拉萨的同意和支持下<sup>49</sup>，郑安泉等人开始着手将成立注册青年会并很快得到批准。在1974年12月1日<sup>50</sup>成立了第一个在文青部属下注册的华裔青年组织，由当时的地和成功青年会改为地和青年会。为了把青团运扩展到全国各地，郑安泉驾驶一辆达善私家车独自一个人在各地讲解。基于马青马六甲州分团团长的身份，郑安泉去到每一个地方都获得当地的马青分团的接待和协助成立青团运支会<sup>51</sup>。在青团运的成立过程中，马华一直扮演着协调，支持和提供各种方便的角色。

#### 4.4) 青团运领袖与马华的互动

为了获得政治的庇护和活动经济来源，青团运与马华一直维系着良好的关系。许多青团运全国和州级领袖同时也活跃于马华，甚至成为马华的领袖。青团运第三任总会长刘德贤18岁即加入马华，并于1995年代表马华参与大选成为丹巴淡区州议员。青团运第四任至第六任总会长都是马华的基层领袖。另外，马华许多的领导人都曾经活跃于青团运。当中包括马华现任总会长廖忠莱于1983年成为青团运会员，并在1986年出任青团运八打灵再也县会主席。其他从青团运开始踏入政坛的马华前国州议员或中委会成员包括庄祷融、余金福、许金汉等人。因此，青团运往往被华社视为马华的外围组织，也成为马华培训未来领袖的平台。

与此同时，郑安泉本人更是多次卷入马华党争当中。1969年大选过后，马华公会为扭转政治的被动状态，欲进行内部改革而引进专业人士。但当少壮派崛起时，马华领导人却停止改革并引发了1973年2月19日以林敬益、李裕隆、陈忠鸿及杨寿贤为首的少壮派向陈修信发难<sup>52</sup>，发动名为“改革运动”的夺权攻势。随后，林李等少壮派因被开除党籍而出走加入民政党<sup>53</sup>。郑安泉当时已经担任马青马六甲州分团团长和马华中央教育委员

---

<sup>45</sup> 新生活报，1994年3月12日。

<sup>46</sup> 星洲日报，1994年2月25日。

<sup>47</sup> 根据青团运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特刊的第14页青团运历史记载，郑安泉当时是到有关活动地点，即马六甲丹絨吉灵政府别墅寻找朋友而无意中听到部门官员的讲解。

<sup>48</sup> 新生活报，1994年3月5日。

<sup>49</sup> Gerakan Belia Bersatu Malaysia (Mei 1984), “Gerakan Belia di Malaysia”, KL: GBBM, pp. 32.

<sup>50</sup> 见于 GBBM 编，Gerakan Belia di Malaysia, Mei 1984，页 32。

<sup>51</sup> 新生活报，1994年3月5日。

<sup>52</sup> 曾庆豹，〈政治伦理与华人政治的意识形态批判〉；何启良：《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4年，108-124页。

<sup>53</sup> 李若云，〈马来西亚华人政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李元瑾：《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2年，175-200页。

会委员<sup>54</sup>。接着郑安泉在 1979 年支持曾永森挑战李三春竞选马华总会长和 1984 年马华党争时支持梁维泮对抗陈群川，出钱出力。郑安泉因为所支持的候选人在党争中被挫败而在马华内部受到压制。根据李焯钧和陈德贤透露，郑安泉的野心却逐渐的壮大至希望把青团运的势力渗透至全国各个华团组织，以领导华人大团结的远景。梁维泮亦答应安插青团运代表进入全国各地的新村发展委员会。当郑安泉决定跟随梁维泮淡出政坛后，来自马华的副财政部长拿督陈忠鸿却邀请他重返政坛，接任人民进步党的党主席职位<sup>55</sup>。

## 5. 结语

青团运虽然成立于青年运动的低潮初期，但它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微妙的因果关系。青团运既是执政党收编和分化左翼青年最为成功的布局，也是马华扩展势力的外围组织，更是郑安泉欲达成掌控华团野心的最佳平台。青团运也是近四十年来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和争论性的华裔青年组织。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青团运的崛起和没落都是紧紧地维系在郑安泉的身上。青团运早期的成功崛起可以归纳三方面的因素，即（i）郑安泉的个人领袖魅力和才华，（ii）缺乏让华裔青年参与的组织，和（iii）马华公会的支持。

随着 1986 年中旬爆发合作社风暴，青团运合作社被中央银行冻结和接管。郑安泉在 1986 年 7 月被逼辞去他所辛苦经营的青团运和青团运合作社领导职位，更因为失信罪而锒铛入狱八年。青团运风光不在，历经了约 20 年最艰难的低潮岁月，在多位接任总会长的带领下会务才开始回到正轨并重新发展成马来西亚主要的华裔青年组织之一。如今的青团运已经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稳健成长为一个提供马来西亚华裔青年自我提升和参与社会建设的平台。

鸣谢：此研究计划由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中央委员会赞助经费及提供资料完成。

## 参考资料：

### A) 书籍

1. 石焜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年。
2. 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 – 2005》，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6 年。
3. 陈剑，《风云书丛第四辑：风雨征程—地下组织新盟简史》，八打灵：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3 年。
4. 詹缘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第十四期，2011 年。
5. 林彦安，《隆雪华青与废除大专法令运动》，八打灵：拉曼大学毕业论文，2012 年。
6.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资料组，《人民力量：一个不间断的传统》，八打灵：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1 年。
7. 林勇，《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1957 – 2005）》，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年。

<sup>54</sup> 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Hotel Abadi, Kuala Lumpur, 1978 年 12 月 27 日。

<sup>55</sup> 新生活报，1994 年 3 月 5 日。

8. 杨建成, 《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2年。
9. 何启良, 《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94年。
10. 李元瑾, 《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 2002年。
11. 郑文泉、傅向红, 《粘合与张力: 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内关系》, 加影: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2009年。

## **B) 青团运出版刊物及会议记录**

1. 青团运合作社及青团运总会, “GBBM KOSATU 简介”, 1985年。
2. 青团运, 《郑安泉言论集一: 1982年至1983年》, 吉隆坡: 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 1984年。
3. Gerakan Belia Bersatu Malaysia, “Gerakan Belia di Malaysia”, KL: GBBM, 1984.
4. 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记录, 1974年。
5. 青团运, 《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特刊》, Hotel Abadi, Kuala Lumpur, 1978年12月26日。
6. 青团运章程, 1975年, 1976年, 1978年, 1985年。
7. 青团运中央代表大会及中委会会议记录, 1975年8月15日至1985年11月17日。
8. 马六甲州青团运第一次会员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1975年2月8日。
9. 马六甲州理事会议通知信函, 1975年11月3日。
10. 马六甲州代表大会及理事会会议记录, 1975年2月8日至1975年11月10日。

## **C) 报章与网页**

1. 新生活报, 1994年3月5日; 1994年3月9日; 1994年3月12日。
2. 建国日报, 1982年12月6日; 1984年10月20日; 1985年5月28日。
3. 星洲日报, 1985年1月28日; 1986年3月4日; 1986年3月13日; 1994年2月25日。
4. 星报, 1985年5月20日。
5. 建国日报, 1985年5月28日。
6. 通报, 1983年3月19日。
7. 李亚遨: 《淹没的激情—当年马大一场反对「国家文化政策」的斗争》, 东方日报, 2007。
8. 李亚遨, 《1970-80年代华社维权运动与春雷》, 林连玉基金网页, 2010年12月21日。 <http://llgcultural.com/1970-80年代华社维权运动与春雷/>